

邻里互动、主观幸福感与小镇青年 社区民主政治参与^{*}

徐旻霞 郑 路

摘要: 城镇化的推进和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小镇青年逐渐成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的新势力。通过对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显著高于城市青年,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以及主观幸福感均高于城市青年,参与社区民主政治的积极性也更高。小镇青年在社区参与和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推进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也有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 小镇青年 社区治理 社区民主政治 邻里互动 主观幸福感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趋势逐渐增强。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点,乡镇和县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也不断提升;县域经济蓬勃发展,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在此背景下,作为生活在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推动县域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的主要力量,庞大的小镇青年群体进入大众视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现有研究初步探讨了小镇青年的生存状况(张龙等,2020)、置业观念(吕德文,2018)、身份认同(王成龙、武晓伟,2019)、消费特点和城乡流动(蒋淑媛、罗嫚妮,2019;王玉玲等,2019)等,但是较少关注小镇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中的参与情况。

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是居民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肖林,2011)。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乡镇和县城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基层社会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郎友兴、葛俊良,2014)。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的情况下,基层社区越来越多地承载了公共服务和民主政治在微观层面的兜底功能,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曹海军,2018)。同时,青年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因此,作为生活在乡镇和县城社区里的核心群体和中坚力量,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民主政治参与不仅关系到基层社区内部治理,也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相关,对此问题的探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现有研究仅对中国城市青年的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进行了讨论,发现中国城市青年逐渐表现出“政治冷漠”和“社会疏离”的趋势(程桂龙,2018),在各类社区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非常低(黄永亮,2021)。那么,小镇青年这一特殊的青年群体在社区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和大城市青年有无差别?体现出怎样的特征?原因何在?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研究”(21ZDA111)阶段性研究成果。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文责自负。

本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研究采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的数据,考察小镇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参与中的特征及其成因。这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小镇青年群体及其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的认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对提升中国青年群体的社区参与水平、推动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完善、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小镇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

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是指居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区范围内的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的政治行为,包括选举社区公共权力机构负责人、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管理和监督社区公共事务等(胡荣, 2008)。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形式,也是居民参与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赵中源、刘兴旺, 2014)。

长期以来,青年的社区参与、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既有研究比较了不同时期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模式,探讨了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也分析了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青年群体越来越重视从自我兴趣、人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出发,参与兴趣爱好类自组织,参加慈善捐赠和志愿活动等社会公益服务(李春玲, 2015; 时昱、沈德赛, 2018)。但是在政治参与方面,青年群体尤其是城市青年却表现出较为冷漠的政治态度和较低的政治参与度(程桂龙, 2018)。究其原因,在宏观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竞争日益激烈。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青年群体容易产生群体性焦虑和失落。此外,青年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但是又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和争取途径,青年群体逐渐产生政治无力感,成为低批判力、低行动力和低参与度的“退缩型”主体(宋德孝, 2018)。在微观层面,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政治面貌、社会态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政治效能感等)和社会资本等因素也对青年的政治参与产生重要影响。不过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渠道,使青年多元化的政治诉求得以表达,成为提升青年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度的重要途径。

在社区参与方面,现有研究多强调青年是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但是目前中国青年群体在社区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同样较低。在社区层面,城乡之间与城际之间的人口流动性增强,导致社区人口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增加,居民的社区认同度、社区融入度和社区社会资本也随之降低(蔡禾、贺霞旭, 2014);在个体层面,居民的生活压力增大,工作时间延长,无暇顾及社区公共事务。这些因素都阻碍了青年特别是大城市青年的社区参与。部分青年虽然有较高的社区参与意愿,但是实际参与率却很低(吴同、邓洋洋, 2020),难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上述研究大都聚焦大都市社区以及城市青年群体,没有关注到青年群体的内部差异,尤其是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的差别。小镇青年生活在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他们的个体特征、工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都与大城市青年不同。小镇青年的社会经济压力整体而言小于城市青年。他们生活稳定,闲暇时间较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条件更加充足,主观积极性也更高。而且,小镇青年所在社区人员流动性较低,社区人口异质性较弱,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认同度以及社区融入度均高于城市社区(田北海、王连生, 2017)。换言之,城市青年容易因为个体和社区的双重障碍性因素被排斥在社区公共事务之外,成为社区参与的边缘性居民;而小镇青年则有更多的时间、机会和意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高于城市青年。

(二) 邻里互动与小镇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

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中的差异可以从社区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解释。在社区层面,社区内的邻里关系和邻里互动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邻里的互动与联系既是社区居民互利互惠和互相信任的载体,也是社区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居民在邻里互动的过程中搭建起社区内的社交网络,提高对社区成员以及社区整体的信任,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同时也能增强在社区内的安全感、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社区融入度,这些均有助于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桂勇 2005; 方亚琴、夏建中,2019)。陈丹引和闵学勤(2021)收集了覆盖126个社区的微信事务群的日常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邻里互动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线上社区参与度;胡荣(2006)基于福建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也显示,社区互动水平和社区认同度越高、社区社会资本越丰富的村民,在基层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度越高。

然而,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大城市社区中邻里互动的频率比较低,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亲密的邻里关系在大城市社区里出现断裂(李艳丽、蔡芳媛 2020)。城市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指出,大都市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和匿名性都较强,居民又过分依赖正式组织,邻里关系容易因经常性的搬迁和城市生活的不断个体化而遭到破坏。在物理空间层面,大城市社区空间较大,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环境整洁,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充足。但是居住条件和物理环境的改善可能会增加社区居民对住房地点的依恋,对促进邻里关系和社区互动却作用甚微;在社会空间层面,大城市社区人口规模大,居住密集,加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社区人口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异质性(教育背景、职业类型、生活经历等)不断增强,人际关系中的原子化倾向和个人主义观念盛行,这一特征在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此外,大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快、工作强度大,休闲和社交时间被不断压缩(张自然等 2011)。种种因素使大城市社区里的人际信任和互动水平降低,社区居民之间缺乏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社区社会资本减弱,社区共同体也遭遇重大挑战(蔡禾等,1997)。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居住在大城市商品住宅小区的居民,邻里关系显著弱于其他社区(蔡禾、贺霞旭 2014)。

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中间地带,是大城市和农村的连接点和缓冲带。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乡镇、县城和中小城市不断承接并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空间特征;其社区生态一方面受到城镇化的影响,不复传统农村集人情、信任和利益为一体的“熟人社会”,但是另一方面也明显区别于大都市的原子化和“陌生人社会”,是一种“半熟人社会”(夏支平 2010)。相比于大城市社区,小镇青年所在的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社区的规模较小,人口流动性和异质性也较低,居民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时间更长,邻里关系更融洽,邻里互动效应也会高于大城市社区。而相对紧密的邻里互动有助于提升青年的社区融入度,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民主政治的积极性。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1: 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高于城市青年;

假设 2.2: 青年的邻里互动频率越高,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越高;

假设 2.3: 邻里互动对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 主观幸福感与小镇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

在个体层面,社会心理因素(如主观幸福感)也会深刻影响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居民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当下的生活境遇以及所依循的社会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其心理感知和判断。主观幸福感代表居民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整体性、情感性认知和评价,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既与宏观层面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不平等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因素相关,也受到微观层面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鲁元平、王韬 2010)。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综合指标,能更加真实、具体、全面地反映青年的社会经济条件、生存现状和生

活态度等。同时,主观幸福感也会反向影响居民的政治行动、经济行动和社会行动;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居民,对待生活越乐观积极,自我效能感越高,也越容易产生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行为。李树和陈刚(2015)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研究表明,幸福感上升能够有效增加劳动力的人际交往,提升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一项基于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发现,主观幸福感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对他人和社会的整体信任,提高居民参与政治选举、社交聚会、志愿活动、文体活动和宗教活动的积极性(Guven, 2011)。

城市青年和小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存在较大差异。大都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较高,但是生活成本也较高、收入差距较大、贫富分化严重,居民参照相关群体进行比较之后对自身条件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较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反而较低(刘军强等, 2012)。此外,大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导致青年群体中非理性的“内卷化”明显,职业发展、婚姻、住房、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多重社会经济负担所引发的城市青年的群体性焦虑和失落,削弱着城市青年的自我效能感,使部分城市青年在社会结构性困境的约束下无奈“躺平”,呈现出“低欲望”和“退缩型”的状态,降低了城市青年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林龙飞、高延雷, 2021)。相较之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渐弥补了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的物质条件差别,小镇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又较为稳定,生活成本较低,社会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小镇青年有更大可能与父母、亲人在同一城市居住,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也更多,主观幸福感高于城市青年,参与社区民主政治和其他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也更高。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1: 小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市青年;

假设 3.2: 青年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越高;

假设 3.3: 主观幸福感对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始于 2003 年,基本上每两年进行一次,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是中国最早的全国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2017 年 CGSS 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 12582 份。

(二) 样本筛选与变量测量

1. 小镇青年定义

首先,青年的年龄范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更一直在变化。本研究参考郭未和鲁佳莹(2020)的做法,广义上将青年年龄定义为 15 岁至 44 岁,既包含青少年,也包含青年成人,这一年龄群体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然后,考虑到中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本研究进一步将青年的年龄范围限制为 18 岁至 44 岁,由此删去其他年龄段的 8127 个样本。

其次,小镇青年是一个具有社会时代特征的比喻性用语,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想象。“小镇”并非单指真实意义上的乡镇,而是与一线、二线大城市相对的差异化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活场域(鲍鲟、马中红, 2019)。小镇青年广泛地代表着在经济条件、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带有小城和乡镇烙印、与大城市青年相区别的青年群体。由于小镇青年的群体构成十分复杂,目前尚未对小镇青年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根据既有研究分析小镇青年的基本特征(张龙等, 2020; 赵霞、孙宏艳, 2019; 吕德文, 2018),同时参考拍拍贷和南方周末联合发布的

《2018 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①和《2019 年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白皮书》^②中的描述,本研究根据工作性质和生活地点,将生活在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且从事非农业劳动的青年均定义为小镇青年。

现有的部分研究根据出生地的级别来划分小镇青年(蒋淑媛、罗嫚妮 2019),但这一划分方式更适用于讨论青年的流动状况。本研究关注的主题是青年在自己生活的社区的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情况,所以根据他们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地点进行划分更具有合理性。

本研究将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进行比较,所以删去从事农业劳动的 423 个青年样本。此外,本研究还根据变量设计,剔除了关键信息缺失或不适用的 973 个青年样本,最终共有 3059 个信息完整的青年样本。

2. 自变量

自变量(解释变量)是青年类型,即是否为小镇青年。采用第一财经旗下“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7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③作为城市等级的划分指标。该榜单根据 18 家各领域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 170 个主流消费品牌的商业门店数据,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指数评估了 2017 年 338 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计算综合得分进行排名,并将所有城市划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六类,排名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广泛应用于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

根据该榜单和 2017 年 CGSS 数据中的采访地点信息,将在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市区工作和生活的青年编码为“1”(小镇青年),将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市区工作和生活的青年编码为“0”(城市青年)。

3. 因变量

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是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根据 2017 年 CGSS 问卷中的问题“上次村/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在样本筛选时已经剔除了选择“没有投票资格”的样本,所以现存的分析样本都拥有投票资格,然后将参加投票的编码为“1”(参与),没有参加投票的编码为“0”(没有参与)。

4. 中介变量

有两个中介变量。第一个是邻里互动。根据 2017 年 CGSS 问卷中的问题“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将选项“从来不”“一年 1 次或更少”“一年几次”“大约一个月 1 次”“一个月几次”“一周 1 次到 2 次”和“几乎每天”由 1 分到 7 分依次赋值,生成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邻里互动频率越高。第二个是主观幸福感。根据 2017 年 CGSS 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将选项“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由 1 分到 5 分依次赋值,生成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主观幸福感越高。

5. 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对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设置受访青年性别(男性 = 1,女性 = 0)、年龄、年龄平方、教育水平(受教育年限,单位:年)、职业类型(非农工作 = 1,无工作 = 0)、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1,其他 = 0)、婚姻状况(已婚 = 1,未婚、离婚或丧偶 = 0)、家庭年

① 南方周末 2018,《这股改变潮水方向的力量,长什么样?》南方周末 x 拍拍贷首发《2018 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7 月 30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s/137934>),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

② 南方周末 2019,《2019 年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白皮书》,9 月 23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s/159531>),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

③ 外唐智库 2017,《2017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5 月 26 日(<https://www.waitang.com/report/1338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

收入(1%缩尾处理后加0.1再取Log对数,原单位:万元)、房产数量、社会保障(有社会养老保险=1,无社会养老保险=0)、所在省份地区(西部地区=1,中部地区=2,东部地区=3)、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2017年所在省份GDP,单位:万亿元)和所在省份经济市场化程度13个控制变量。其中,所在省份经济市场化程度通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相应年份各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来衡量(王小鲁等,2019)。模型中各变量的部分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N=3059)

变量名称	类别	百分比/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社区民主政治参与	参与	31.78%	—	—	—
	没有参与	68.22%	—	—	—
自变量					
青年类型	小镇青年	60.48%	—	—	—
	城市青年	39.52%	—	—	—
中介变量					
邻里互动	—	3.39	2.07	1	7
主观幸福感	—	3.91	0.78	1	5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	52.93%	—	—	—
	男性	47.07%	—	—	—
年龄	—	32.52	7.15	18	44
年龄平方	—	1108.41	460.14	324	1936
教育水平	—	12.21	3.94	0	19
职业类型	无工作	23.90%	—	—	—
	非农工作	76.10%	—	—	—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9.94%	—	—	—
	其他	90.06%	—	—	—
婚姻状况	已婚	69.96%	—	—	—
	未婚、离婚或丧偶	30.04%	—	—	—
家庭年收入	—	11.10	1.61	-2.30	13.82
房产数量	—	1.11	0.71	0	5
社会保障	有社会养老保险	61.92%	—	—	—
	无社会养老保险	38.08%	—	—	—
省份地区	西部地区	22.56%	—	—	—
	中部地区	22.69%	—	—	—
	东部地区	54.76%	—	—	—
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	3.52	2.30	0.26	8.97
省份经济市场化程度	—	7.80	1.79	2.93	10.46

注:对定类变量,呈现百分比;对非定类变量,呈现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 统计模型与方法

首先,通过罗切斯特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和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 Regression)模型考察邻里互动、主观幸福感和小镇青年以及城市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的关系;其次,采用因果步骤法、Sobel 检测、KHB 检测和 Bootstrap 方法检验邻里互动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最后,通过改变变量测量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研究结果

(一) 小镇青年的群体特征

表 2 展示了小镇青年的基本特征。小镇青年在总体样本中占比 60.48%,大约是城市青年的 1.5 倍。小镇青年平均年龄为 32.62 岁;男性占比 45.62%;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14 年,比城市青年低 2.72 年。小镇青年家庭收入较低,平均家庭年收入 7.59 万元,大约仅占城市青年家庭年收入的 40%。在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方面,34.81%的小镇青年参与了社区民主选举,这一比例在城市青年中仅有 27.13%。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较高,平均得分为 3.74 分,比城市青年高 0.88 分。小镇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 3.89 分,略低于城市青年。表 2 中数据初步展现了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不过还需要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

表 2 小镇青年的群体特征描述(N=3059)

	样本占比	平均年龄(岁)	平均教育年限(年)	平均家庭年收入(万元)
小镇青年	60.48%	32.62	11.14	7.59
城市青年	39.52%	32.35	13.86	17.98
	男性占比	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百分比)	邻里互动(均值)	主观幸福感(均值)
小镇青年	45.62%	34.81%	3.74	3.89
城市青年	49.30%	27.13%	2.86	3.94

(二) 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邻里互动与主观幸福感

表 3 展示了小镇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的 Logistic/OLS 模型回归结果。由模型 1 可知,相比于城市青年,小镇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度显著更高。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1。

模型 2 显示,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显著高于城市青年,假设 2.1 得到了验证。城市住房格局改变和人口流动性加强等社会条件的更新使得传统邻里关系出现断裂趋势,现代大城市社区中的邻里关系较为陌生和紧张;相较之下,乡镇、县城和中小城市社区则更多地保持着传统人情社会的特征,邻里互动较为紧密,有助于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模型 3 的结果表明,小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城市青年,假设 3.1 得到验证。

模型 4 和模型 5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两个中介变量。由模型结果可知,中国青年的社区邻里互动频率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参与社区民主政治的概率就越高,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2.2 和假设 3.2。同时,模型 4 和模型 5 显示,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依然显著高于城市青年,但是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 0.379 和 0.417,与模型 1 中回归系数的绝对值 0.429 相比,分别下降了 0.05 和 0.012。结合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相关结果,按照因果步骤法的检验逻辑(温忠麟、叶宝娟,2014),说明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在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以及主观幸福感均高于城市青年,所以参与社区民主政治的积极性也更高。假设 2.3 和假设 3.3 得到验证。

表3 小镇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的 Logistic/OLS 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社区民主 政治参与	邻里互动	主观幸福感	社区民主政治参与	
小镇青年 (参照组: 城市青年)	0.429 *** (0.114)	0.318 *** (0.098)	0.104 *** (0.037)	0.379 *** (0.114)	0.417 *** (0.115)
邻里互动				0.133 *** (0.020)	
主观幸福感					0.145 *** (0.054)
男性 (参照组: 女性)	0.003 (0.084)	0.032 (0.075)	-0.056 ** (0.028)	-0.002 (0.084)	0.007 (0.084)
年龄	0.227 *** (0.063)	0.042 (0.052)	-0.073 *** (0.020)	0.225 *** (0.064)	0.237 *** (0.063)
年龄平方	-0.003 *** (0.001)	-0.001 (0.001)	0.001 *** (0.000)	-0.003 *** (0.001)	-0.003 ** (0.001)
教育水平	-0.036 *** (0.012)	-0.064 *** (0.011)	0.033 *** (0.004)	-0.028 ** (0.012)	-0.040 *** (0.012)
非农工作 (参照组: 无工作)	-0.003 (0.107)	-0.376 *** (0.094)	-0.028 (0.036)	0.050 (0.108)	-0.000 (0.107)
中共党员 (参照组: 其他)	0.144 (0.138)	-0.018 (0.127)	0.043 (0.048)	0.153 (0.139)	0.138 (0.139)
已婚 (参照组: 其他)	0.153 (0.117)	0.438 *** (0.102)	0.343 *** (0.039)	0.092 (0.118)	0.102 (0.119)
家庭年收入	-0.028 (0.028)	0.023 (0.025)	0.010 (0.009)	-0.032 (0.028)	-0.029 (0.028)
房产数量	0.150 *** (0.058)	0.042 (0.052)	0.116 *** (0.020)	0.150 ** (0.059)	0.133 ** (0.058)
有社会养老保险 (参照组: 没有)	0.244 *** (0.092)	0.062 (0.082)	0.050 (0.031)	0.236 ** (0.093)	0.238 ** (0.092)
地区(参照组: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0.126 (0.127)	-0.100 (0.113)	0.142 *** (0.043)	-0.125 (0.128)	-0.145 (0.127)
东部地区	-0.111 (0.149)	-0.513 *** (0.135)	0.126 ** (0.051)	-0.045 (0.150)	-0.130 (0.149)
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0.060 *** (0.021)	0.103 *** (0.019)	-0.013 (0.007)	0.047 ** (0.021)	0.062 *** (0.021)
省份经济市场化程度	0.040 (0.041)	-0.095 *** (0.036)	0.025 (0.014)	0.048 (0.041)	0.037 (0.041)
样本量	3059	3059	3059	3059	3059
伪 R ² /R ²	0.050	0.095	0.081	0.061	0.052
LR chi ²	190.20	—	—	233.72	197.43

注: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的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下同。

(三)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三种方法对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首先,采用 Sobel 检验。结果显示,邻里互动的 Sobel 检测的 p 值小于 0.01,主观幸福感的 Sobel 检验的 p 值小于 0.05,说明这两个变量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Sobel,1982)。其次,对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进行 KHB 分解,考察两个中介变量的贡献率。结果再次显示,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对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小镇青年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高于城市青年的原因有 10.04% 可以通过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更高来解释,有 3.49% 可以通过小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更高来解释(Karlson et al.,2010)。最后,采用自举法(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的 95% 置信区间都不包括 0,并且 p 值小于 0.05,说明存在间接作用,中介效应成立(Preacher & Hayes,2008)。上述结果再次支持了假设 2.3 和假设 3.3,也反映出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对于中国青年群体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

表 4 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N=3059)

中介变量	邻里互动	主观幸福感
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		
Sobel	0.009***	0.003**
Goodman - 1(Aroian)	0.009***	0.003**
Goodman - 2	0.009***	0.003**
Decomposition Using the KHB Method		
总效应	0.421***	0.432***
中介效应	0.042***	0.015**
贡献率	10.04%	3.49%
Bootstrap Results - 2000reps		
_bs_1 95% 置信区间(P)	[0.004 0.016]	[0.001 0.007]
_bs_1 95% 置信区间(BC)	[0.004 0.016]	[0.001 0.008]
_bs_1 p-value	0.002	0.047

(四) 稳健性检验

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改变小镇青年的划分方式,重新进行回归。首先,本研究采用最广义的小镇青年定义,只根据工作和生活地点进行划分,将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也纳入分析范围,得到 3438 个信息完整的青年样本。然后,将在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市区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划分为城市青年;将在乡镇、县城和三线及以下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划分为小镇青年。结果显示,小镇青年占比 64.54%,城市青年占比 35.46%。本研究采用新的自变量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小镇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度依然显著高于城市青年($\beta=0.412$, $p=0.000$),社区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也依旧对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贡献率分别为 12.54% 和 2.61%。其次,本研究将青年群体划分为农村青年、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三类。将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也纳入分析范围,得到 3438 个信息完整的青年样本。然后,将生活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市区且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划分为城市青年;将生活在村镇且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划分为农村青年;其余划分为小镇青年。结果显示,农村青年占比 9.08%,小镇青年占比 55.47%,城市青年占比 35.46%。本研究使用新的三分类自变量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小镇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度依然显著高于城市青年($\beta=0.408$, $p=0.000$),社区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也仍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村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也显著高于城市青年($\beta=1.173$, $p=0.000$),但是主观幸福

感对农村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第二,改变青年群体的划分方式,重新进行回归。本研究将青年的年龄范围调整为18岁至39岁,得到2411个信息完整的青年样本,然后重复正文中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beta = 0.463$, $p = 0.000$)、社区邻里互动($\beta = 0.329$, $p = 0.003$)以及主观幸福感($\beta = 0.118$, $p = 0.004$)显著高于城市青年,社区邻里互动仍然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贡献率为7.12%。

上述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是较为可靠的。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小镇青年在推动中国基层经济增长、政治建设、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小镇青年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是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和基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小镇青年是生活在城乡基层社区的核心群体,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对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2017年CGSS的数据,考察中国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参与中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度显著高于城市青年。机制分析表明,邻里互动和主观幸福感可以提高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度,对小镇青年的社区民主政治参与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小镇青年在社区中的邻里互动频率以及主观幸福感均高于城市青年,因而参与社区民主政治的积极性也更高。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揭示了小镇青年在社区民主政治参与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小镇青年群体特征及其社区民主政治参与行为的认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结果对推进中国基层社区治理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应当重视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建设,加强城市社区居民的互动,充分调动城市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其次,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减轻城市青年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提高城市青年的生活满意度、机会感、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更好发挥青年群体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最后,相关部门应当不断拓宽小镇青年的社区参与渠道,深入挖掘小镇青年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潜力,积极动员、引导、鼓励、支持小镇青年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充分发挥小镇青年的社区参与优势,不断提高小镇青年群体的社区参与水平和参与质量,更好提升中国基层社区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 鲍鲲、马中红 2019,《从“游戏即生活”到“游戏只是游戏”——小镇青年的网游实践与现实生活》,《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 蔡禾、贺霞旭 2014,《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 1997,《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曹海军 2018,《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政治学研究》第1期。
- 陈丹引、闵学勤 2021,《线上社区参与的邻里效应——基于社区微信群的实证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程桂龙 2018,《政治社会化理论视阈下高校学生政治冷漠现象管控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第4期。
- 方亚琴、夏建中 2019,《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桂勇 2005,《城市“社区”是否可能?——关于农村邻里空间与城市邻里空间的比较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郭未、鲁佳莹 2020,《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

- 年研究》第2期。
- 胡荣 2006,《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008,《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黄永亮 2021,《中国“90后”青年的社会参与研究》,《青年研究》第4期。
- 蒋淑媛、罗娴妮 2019,《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演化及其逻辑》,《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 郎友兴、葛俊良 2014,《让基层治理有效地运行起来:基于社区的治理》,《浙江社会科学》第7期。
- 李春玲 2015,《青年组织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4年北京青少年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 李树、陈刚 2015,《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第3期。
- 李艳丽、蔡芳媛 2020,《空间互动与社区认同:社区共同体培育的典型路径探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林龙飞、高延雷 2021,《“躺平青年”:一个结构性困境的解释》,《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 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鲁元平、王韬 2010,《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第5期。
- 吕德文 2018,《大城市青年与“小镇青年”的置业观有何不同——让青年置业观与阶层焦虑适当脱钩》,《人民论坛》第33期。
- 时昱、沈德赛 2018,《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现状、问题与路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宋德孝 2018,《青年“佛系人生”的存在主义之殇》,《中国青年研究》第3期。
- 田北海、王连生 2017,《城乡居民社区参与的障碍因素与实现路径》,《学习与实践》第12期。
- 王成龙、武晓伟 2019,《传统与变革:小镇返乡青年的文化与社会融入》,《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 2019,《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玉玲、范永立、洪建设 2019,《小镇青年消费文化特点研究——以文化产业领域为切入点》,《中国青年研究》第6期。
- 温忠麟、叶宝娟 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 吴同、邓洋洋 2020,《从个体到主体:青年社区参与的可能与实现路径——以上海B区青年社区参与行动干预为例》,《青年学报》第1期。
- 夏支平 2010,《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肖林 2011,《“‘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张龙、李薇、王昀 2020,《小镇青年生存状况的代际差异与共青团参与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1期。
- 张自然、袁富华、赵家章 2011,《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反差——中国30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经济学动态》第7期。
- 赵霞、孙宏艳 2019,《小镇青年群体特点及对共青团工作的启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2期。
- 赵中源、刘兴旺 2014,《民主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有序政治参与的时代要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Güven, C. 2011, “Are Happier People Better Citizens?” *Kyklos* 64 (2).
- Karlson, K. B., A. Holm & R. Breen 2010,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Using Logit and Probit: A New Method.”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42 (1).
- Preacher, K. J. & A. F. Hayes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 (3).
- Sobel, M. E. 1982, “Asymptot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 S. Leinhardt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折 曦

Thanks to these findings , we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 cognition towards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Keywords: Meritocracy College Stud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Network Media Contact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mall-Town Youth ’ 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emocracy Xu Minxia & Zheng Lu(70)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 the small-town youth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new force to promote China ’ s political , econ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progresse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levant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 in 2017 ,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small-town youth ’ 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emocrac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urban youth , and this result is robust. According to further study , the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lay partial mediating roles in this process: for the small-town youth , the frequency of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higher than urban youth , hence their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democracy is higher. The small-town you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democracy , which ha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 grassroots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Keywords: Small-Town Youth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Democracy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Youth ’ 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eng Chengcai(81)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youth in Shanghai city ,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youth ’ 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income level could directly influence the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youth ’ 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For the floating youth of white collars , they have high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 which would promote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while for the floating youth of blue collars , they have lower social integration level , which doesn ’ t hinder their final decision-making towards urban settlement. For the floating youth of white collars ,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re better and could purchase houses , which could promote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while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blue collars ,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re poorer and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purchase houses , which could exert some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The related policies could attract floating youth of white-collars and promote their urban settlement intension , but could squeeze floating youth of blue collars to certain extent. Generally speaking , for the floating youth of white-collars , they w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various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ir urban settlement , and hence have stronger urban settlement intension; while for the floating youth of – blue-collars , they decide their urban settlement mainly based on their income level in the city , and hence have weaker urban settlement intension.

Key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Youth White Collars Blue Collar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fluencing Factors